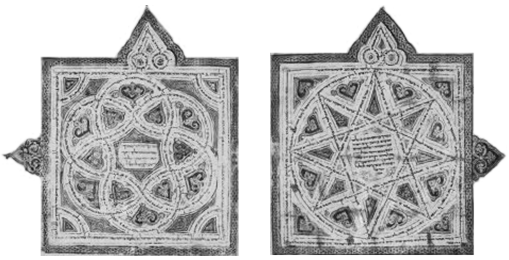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反犹主义动因再思考*

高龙彬　程伟益**

【摘要】美国反犹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而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刺激下重新兴起的反犹主义，成为当时社会动荡与经济困境的直接反映。经济危机作为催化剂，加剧了已有的反犹偏见，使得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呈现出复杂化、扩大化、极端化、组织化以及多种极端思想相融合的特征。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 Committee，AJC)中的档案例如“银衫军，他们的历史、创始人和活动”“希特勒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对威廉·达德利·佩利的报道”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反犹组织的成立背景、创始人以及反犹活动起到重要作用。犹太情报局的相关报道有助于了解美国地方议会、政府出现的反犹主义声音。其他社会群体也在不同领域及不同程度上歧视犹太人，在恶化了犹太群体的生活处境的同时，又直接推动了犹太左翼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反犹主义；犹太人；经济危机

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无疑标志着“咆哮二十年代”[①]的终结。而在这场经济风暴肆虐下，一种更为复杂且敏感的社会现象——反犹主义，也在悄然蔓延并加剧。徐新教授在其著作《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中说：“反犹主义在世界上一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和行为，尽管随着解放运动、社会现代化、宗教的世俗化的发展，反犹主义已经被当作社会的弊病遭到抛弃，但反犹主义的幽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及其影响研究”(24BSS013)阶段性成果。

** 高龙彬，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程伟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

① “咆哮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一段经济极度繁荣、社会变革剧烈、文化创新频现的非凡时期。在这充满活力与变革的十年间，美国的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高峰。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咆哮二十年代”的终结。

却并没有魂飞魄散,而是仍旧在世界上游荡,一遇机会就很可能会出来兴风作浪,煽动仇恨。"[①]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经济危机的爆发为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得这一阶段的反犹主义与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与特征。

一、美国反犹主义的历史渊源

美国反犹主义并非在经济危机期间突然出现,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殖民地时期反犹主义就已初见端倪,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最早出现犹太人可追溯到1492年的路易斯·德托雷斯"[②],但反犹主义并不是随着犹太人进入美洲大陆而自然产生的本土化产物。在欧洲移民群体——包括法国人、德国人等欧洲殖民先驱持续推动以及长时间的传播下,反犹主义才开始在这片新大陆上生根发芽,进而影响部分殖民地对待犹太人的态度。1654年,首批犹太人抵达当时的新尼德兰。"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市)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对贵格会教徒、路德会教徒及犹太人持蔑视态度,并试图阻止23名来自巴西的葡萄牙犹太人留在殖民地。"[③]这成为殖民地时期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存有偏见的一个社会缩影。在欧洲殖民者尚未涉足美洲大陆之前,反犹主义在欧洲已经历了多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随后兴起的欧洲向美洲的大规模移民热潮,反犹主义这一社会思潮也跨越大洋逐渐在美洲大陆上传播。这一历史背景为美国后来反犹主义思潮的演变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成为美国反犹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雏形。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国家的反犹浪潮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部分欧洲国家开始采取某些措施在一些方面对犹太人进行限制。例如"德国各州收紧了征兵规定,限制犹太人可能进入的职业,并限制允许结婚的犹太人数量"[④]。而"1830年和1848年起义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推动了犹太人的出走,因为年轻人希望扩大他们的视野,确保他们的未来"[⑤]。与此相反的是,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并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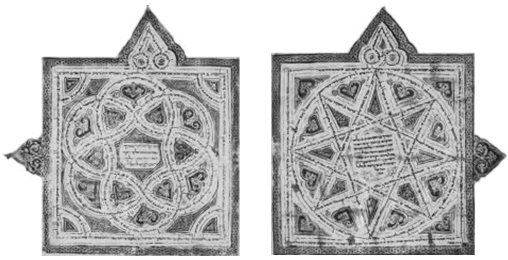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① 徐新 Xu Xin,《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Anti-Semitism: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5),309。

② 邓蜀生 Deng Shusheng,〈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of American Jews],于《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1989年第2期[1989,Issue 2],28—37。

③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④ 同上,24。

⑤ 同上。



对犹太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做出很大的限制，正是在这种情况的驱动下，大量的犹太人前往美国，希望在这广袤的新大陆上取得一番成就。“1830 年，美国犹太人口约为 4500 人，1845 年上升到约 40000 人，到内战时跃升至 150000 人。”①

但是，这一时期犹太群体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因为移民数量的增加而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到 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更加严峻。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围绕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卷土重来，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仇恨急剧增加，公开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多。“1850 年，底特律的报纸称犹太人为‘神秘的’‘被诅咒的’‘流浪者’。”②“而 4 月 6 日出版的《纽约先驱报》则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犹太人在中东将一名基督教传教士放血致死，磨碎他的骨头，并将他的血与逾越节盛宴的无酵饼混合。然后在 9 月，赎罪日前夕，谣言在纽约市传播，犹太人为了这个节日谋杀了一个非犹太女孩。由于这个谣言，第二天早上大约 500 名男子，其中大部分是爱尔兰血统，在警察的带领下，在犹太年最神圣的一天入侵并洗劫了一座犹太教堂。”③

反犹主义浪潮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在美国内战期间进一步扩大，并达到第一次高潮。在内战之前，反犹主义大多仅限于北方各州。而在战争爆发后，反犹主义也在南方开始蔓延。由于南方承受了比北方更多的伤害，南方民众的失望感以及仇外心理更为强烈。人们普遍认为“犹太商人囤积商品，并以勒索的价格出售商品，从而加剧了南方的贫困”④。这成为当时美国民众对犹太人的普遍共识。除普通民众之外，当时的美国南方政府同样有类似的看法。时任南方邦联总统的杰弗逊·戴维斯指责犹太人说：“他们创造了巨额财富，同时使我们的货币贬值，并使我们国家的生产枯竭，而这些生产构成了战争期间所需的最宝贵的资源。”⑤这种反犹主义的态势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减弱，反而有所加剧。从内战结束至 20 世纪之初，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反犹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从体面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到农业抗议者、新教和天主教的发言人，以及精神病边缘的成员，越来越多地关注犹太人所谓的有害特

①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5.

② Robert A. Rockaway, “Anti-Semitism in an American City: Detroit, 1850-1914,”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Quarterly* 64 (September 1974): 42-54.

③ Jonathan D. Sarna, *Jacksonian Jew: The Two Worlds of Mordecai Noa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9.

④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33.

⑤ Jaher Frederic Cople, *A Scapegoat in the New Wilderness: The Origins and Rise of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7.

征,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对美国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报纸期刊的发展也对反犹主义思潮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一份对 1890 年至 1924 年期间巴尔的摩三家天主教报纸上发表的社论进行的学术分析发现,所有的编辑都怀有传统的反犹主义印象,他们将犹太人描绘成基督杀手,在这 34 年间,《天主教人民报》(*Katholische Volkszeitung*)上超过 80%的关于犹太人的社论都充斥着恶毒的反犹主义言论。"[②]这使普通民众对犹太人的看法逐渐从渐进性的情绪化的表达,到最终促成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广泛达成"犹太人有害"的共识。

进入 20 世纪后,犹太群体的生活处境和舆论环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好转,反而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该世纪头 20 年里,种族主义成为美国反犹情绪的核心组成部分。"[③]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夹杂了诸多的种族因素。进步时代下的美国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然而在正视、公平对待犹太人方面却恰恰相反,虽然部分犹太人的经济地位通过一系列商业活动得到提高,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进一步歧视犹太人。

1918 年一战结束至 1929 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反犹主义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尽管美国部分犹太裔在一战期间积极响应号召入伍,并表现出丝毫不逊于其他本土人民及其他种族对美国的忠诚度,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美国民众对犹太人的敌意令人震惊地增加了。"其他欧洲群体普遍因同化而获得尊重,地位得到提高,而犹太人则随着自身地位的提高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厌恶。他们越是热衷于接受和参与美国生活,他们的声誉似乎就越受损。"[④]或许,换一种角度可以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毕竟,反犹主义传统在这个国家存在了几个世纪。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凡尔赛会议上"颗粒无收"的事实激起了美国民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红色恐慌"。1924 年一位芝加哥的波兰人写道:"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犹太人领导社会主义,犹太人通过社会主义努力在各国煽动骚乱和社会动荡,这总是对基督教社会造成伤害,而犹太人却从中创造利润和收益。"[⑤]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犹太人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美国的化身。犹太人被广泛地等同于布尔什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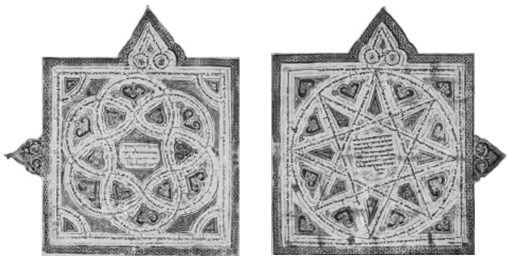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①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35.

② Van Rahden, "Beyond Ambivalence: Variations of Catholic Anti-semitism in Turn of the Century Baltimore,"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82 (1994): 7-42.

③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58.

④ John Higham,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n America, 1830-1930,"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47 (September 1957): 1-33.

⑤ Edward R. Kantowicz, *Polish-American Politics in Chicago, 1880-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24.



克主义者。这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情绪蔓延到了对犹太人的恐惧上。“1924 年,佛罗里达州一个社区的商会秘书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上的极端表达,当时他主张将所有犹太人和外国人驱逐出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使该社区成为 100% 的美国非犹太人城市。”[①]这种极端的情绪表达普遍反映了美国民众的心理愿望即排斥外来移民,尤其是犹太人。这在美国当时的移民政策的制定上得到了体现。

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其具体表现就是在 1903 年出版的《锡安长老议定书》。[②] 这个文件原本由俄罗斯帝国秘密警察炮制,称犹太人是“魔鬼的代理人”。尽管这个文件毫无事实依据且充满了荒谬的色彩,但是被反犹主义者奉为“圣经”,借机来大肆攻击犹太人。该文件称:“为了达到目的,犹太人通过各种秘密组织,宣传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是历史上所有社会剧变的幕后黑手,他们也是阶级斗争、所有政治暗杀和所有重大罢工的幕后黑手。策划者诱使工人变成酗酒者,并试图通过抬高食品价格和传播传染病来制造混乱。”[③]而在 1920 年 5 月 22 日,一篇题为《国际犹太人:世界问题》的文章再现了《锡安长老议定书》的“精髓”,这篇文章出现在亨利·福特所拥有的《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上,其在反犹宣传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篇文章引发了一系列对犹太人的攻击。“报纸连续刊登了 91 个星期,然后断断续续地直到 1927 年。《迪尔伯恩独立报》每周的发行量约为 72000 份,到 1922 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30 万。它在 1924 年达到了 70 万份的高峰,仅比当时美国最大的日报《纽约时报》少 5 万份。”[④]独立报的广泛印刷与发行量的急剧猛增,使数百万美国民众,尤其是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民众,阅读了关于描述犹太人犯下的罪恶的故事,他们原本对犹太人知之甚少,这无疑加剧了民众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

美国政府分别在 1921 年和 1924 年两次出台移民法案,这无疑间接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反犹运动。原本已经几乎销声匿迹的美国三 K 党在此时期又活

①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38.

② 《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又译《锡安长老会纪要》或《犹太贤士议定书》,是 1903 年俄国警察炮制的反犹主义小册子。该议定书由 80 页、24 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是犹太人如何消灭包括帝国、君主、教会等一切现有的强权,建立由犹太人统治的超级独裁统治的新帝国。反犹主义者以此为工具,大肆攻击犹太人。

③ Walter Laqueur, *The Changing Face of Anti-Semitis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3.

④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81.

跃了起来。三K党的一位领导人在俄勒冈州南波特兰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犹太人要么是破坏我们政府的布尔什维克,要么是金融或商业领域的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他们控制和指挥基督徒作为借贷者或雇员。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被犹太佬指挥是令人厌恶的。”[①]到20年代末,美国对犹太人的偏见与歧视有所减弱。1927年,福特减少了对犹太人的攻击,移民限制法已经通过,不再是公众评论或定期关注的主题,印第安纳州著名的三K党人的性丑闻和腐败导致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员和活动减少。[②] 1928年出版的《美国犹太年鉴》也写道:“过去的一年见证了所有有组织的反犹宣传停止。”[③]

尽管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反犹主义就已初见端倪并逐渐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土的反犹主义程度明显较弱。与欧洲国家相比,其规模和发生频率均显得较为有限且不常见,缺乏系统性的反犹传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犹太人的处境就会得到好转。“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如此多关注的累积偏见为20世纪30年代更恶毒的攻击奠定了基础。”[④]在此后的十年里,受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歧视犹太人。

二、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反犹主义浪潮的高涨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剧烈动荡。因此,“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反犹主义在程度上远远超过早先的反犹主义”[⑤]。反犹运动在这一时期得到加强,不同社会主体的反犹活动得到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反犹主义浪潮高涨的标志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犹主义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经济危机的爆发为当时的反犹主义者的反犹活动提供了时机和环境。“天主教和新教对犹太人的敌意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同时,对共产主义颠覆社会的恐惧,希特勒的崛起,以及美国的萧条加剧了现有的偏见,导致了对犹太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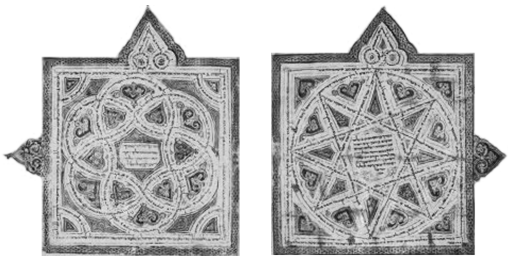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① Clark Malcolm, “The Bigot Disclosed: 90 Years of Nativism,”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75 (June 1974): 109-190.

②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00。

③ AJC,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928-1929,” 276.

④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04.

⑤ Max I. Dimont, *Jews, God, and History* (New York: Signet, 2004), 311.



谩骂性表达。”[①]他们利用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恐慌氛围,散布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试图将社会的不满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以获得政治支持和民众的认同。“1915—1932 年间,美国建立的反犹组织有 5 个,到 1933 年建立起了 9 个反犹组织。”[②]在大萧条之前早已经建立的反犹组织有工业防卫协会、三 K 党、基督教信仰捍卫者、白色乐队等。而在 1929 年至 1933 年建立的反犹主义团体有后来成为德美同盟的新德国之友、银衫军、詹姆斯真理协会、美国法西斯主义者(别名美国卡其色衬衫)、美国蓝军、美国反共联盟、十字军白衫军(1936 年后改为经济自由十字军)、76 骑士团。[③] 这些组织抨击犹太人,指责他们应该对国家的经济困境负责。他们常常将犹太人描绘成贪婪、自私的阴谋家,认为他们操控了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这种刻板印象在经济危机期间得到了强化,使民众进一步加深了对犹太人的偏见。而在这一期间较有影响力以及代表性的反犹组织有新德国之友、银衫军、十字军白衫军。

1.新德国之友(Friends of New Germany)

1924 年 10 月,一个名为“条顿”的反犹组织在芝加哥成立,该组织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同情”纳粹的组织。该组织后在 1932 年初宣布解散,但其重要性表现在该团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新德国之友的领导人。[④] 1932 年初,纳粹党开始在美国陆续出现;同年 6 月 30 日,新德国之友在芝加哥的一次大会上成立。“组织总部设在纽约,成员人数大约 5000～10000 人,在芝加哥有很强的影响力。”[⑤]新德国之友一经成立,就进行了多场反犹反政府的活动,并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最著名且最广为人知的反犹团体之一。“新德国之友打算在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利用德国人、德裔美国人和所有可以煽动起来反抗‘美国犹太政府’的人作为他们的冲锋队。”[⑥]“1933 年 10 月 20 日清晨时分,新德国之友在多伦多分发印有其反犹思想的传单。这些传单劝诫非犹太人意识到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所构成的威胁,并谴责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法国外交部长约瑟夫·

①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12.

② 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32。

③ 参见 Donald S. Strong,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1940*(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139-143。

④ 参见 Donald S. Strong,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1940*, 21。

⑤ Jim Bredemus, “American Bu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Nazism: The German-American Bund Attempt to Create an American Fifth Colum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518142641/.

⑥ “Silver Shirts and Friends of New Germany Plot For, Dream of Fascist Conquest of U.S,” https://www.jta.org/archive/silver-shirts-and-friends-of-new-germany-plot-for-dream-of-fascist-conquest-of-u-s.

保罗-邦库尔是犹太人。”[①]日耳曼联盟(Germanic Alliance)作为新德国之友的坚定支持者,对新德国之友的反犹活动表示支持。其主席奥斯卡·普福斯(Oscar Pfaus)经常在芝加哥举行的新德国之友联盟(League of Friends of New Germany)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详细讨论了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努力为这种迫害辩护。”[②]同时,新德国之友还创办报刊来宣传本团体的反犹思想。在其创办的《德国邮政报》的最新一期中,“新德国之友抨击美国的犹太人由于在世界大战期间的苦难而变得繁荣。它指出,普通人正在通过犹太人对通信和公用事业的控制而受到压迫”[③]。

新德国之友的成立,正如其名所示,深深地烙印着纳粹德国的鲜明色彩,并与当时的德国当局存在着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一组织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使命。与其他反犹主义组织有所不同的是,新德国之友是在纳粹德国的直接插手与干预之下形成的,其宗旨在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广泛传播纳粹的宣传路线和极端思想。该组织的指导思想是包裹在反犹主义外壳下的纳粹主义。尽管在“1935 年,柏林方面出于某种考量,决定切断政府当局与新德国之友之间的所有公开联系,并指示德国国民终止其会员资格,试图使新德国之友在外表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美国的本土组织”[④]。然而,这并未能掩盖其内在的纳粹本质。即便是在这种表面上的割裂之后,新德国之友的活动仍然处处笼罩着纳粹主义的阴影。该组织作为纳粹主义的反犹团体,不仅将美国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推向了极致,更是将这份仇恨与纳粹的种族主义理念紧密结合,从而呈现出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反犹主义的全新特点。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对犹太人的无情打压和排斥上,更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的极端操控和扭曲上,给当时的美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银衫军(Silver Legion of America/ Silver Shi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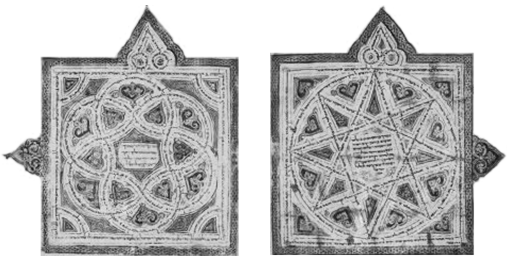
银衫军的创立者威廉·达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或称“首席佩利”(Chief Pelley),1885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林恩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在 40 岁之前,佩利多以从事文学作品的创作来谋生,但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他并

① “Toronto Deluged with ‘Friends of New Germany’ Anti-Semitic Leaflets,” https://www.jta.org/archive/toronto-deluged-with-friends-of-new-germany-anti-semitic-leaflets。

② “Fascists Flock to Christians's Crusaders,” https://www.jta.org/archive/fascists-flock-to-christianss-crusaders。

③ “Nazi Groups, Organizing Throughout U.S. Push Campaign of Propaganda Against Jews,” https://www.jta.org/archive/nazi-groups-organizing-throughout-u-s-push-campaign-of-propaganda-against-jews。

④ Remak Joachim, “Friends of the New Germany: The Bund and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9 (March 1957): 38-41.



没有赢得可观的名声或财富,他的作品经常被出版商拒绝。在此之后,他为了寻求解脱开始进入“唯心主义世界”,成为一名原教旨主义反犹主义者。“在 1930 年,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创立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唯心论企业:加拉哈德出版社、加拉哈德学院、基督教经济学基金会和解放联盟。”①“基督教经济学基金会为他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②

“从 1933 年初开始,佩利积极领导反犹运动,当时他组织了银衫军,恰逢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纳粹思想对佩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③因此,受希特勒上台以及纳粹思想的影响,佩利所创作的内容从精神领域逐渐转向政治领域,随后他在 1933 年 2 月便成立了银衫军。短短一年时间,“其成员人数在 1934 年夏天就已经达到 1.5 万名,成为其人数发展的顶峰。在佩利的领导下共注册了 75000 名会员”④,成为当时美国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反犹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国从苏联主义状态中拯救出来,并指责犹太人正在领导这个国家,他们提议抵御‘掠夺性民族’犹太人的杰出领袖所操纵的金钱权力。”⑤从 1932 年下半年开始,佩利在一期又一期的刊物上发表了越来越广泛和猛烈的攻击犹太人的文章。他认为华盛顿政府中存在大量犹太人,这被视为犹太人控制美国的完整证据,并指控犹太人密谋推翻这个民主制度。“过去所有失去信誉的反犹主义宣传作品,包括《迪尔伯恩独立报》和《锡安长老议定书》都被重新启用。”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记录道:“银衫军不能容忍犹太人在美国官方、金融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主要有三个原因:经济生活中的犹太人方法、犹太人特有的商业法典和犹太人的游牧性格,这使犹太人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最终目标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毁灭和消失。”⑦

1933 年《银色游侠》某期的头版刊登了一份抨击犹太人的材料。“你知道今天犹太人管理着我们的政府吗?你知道世界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而且预计还会更多吗?你知道这 5000000 名犹太人控制着美国 65%的财

① Donald S. Strong,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1940*, 44.

② AJC, “The Silver Shirts: Their History, Founder and Activities,” August 24,1933,2, https://ajcarchives.org/Portal/Default/en-US/RecordView/Index/980.

③ AJC, “Reports of William Dudley Pelley, 1939, 2,” https://ajcarchives.org/Portal/Default/en-US/RecordView/Index/982.

④ “‘Silver Shirts’ Power Told in ‘Today’ Expose,” https://www.jta.org/archive/silver-shirts-power-told-in-today-expose.

⑤ AJC, “The Silver Shirts: Their History, Founder and Activities,” 2.

⑥ 同上,4。

⑦ 同上,5。

富吗？美国90%的共产党领导人是犹太人？”同年银衫军旗下的另一个出版物《白银军团》的编辑们宣称罗斯福总统的国家复兴管理局计划(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Program)是犹太金融家加强对国家控制的计划。蓝鹰的标志被称为“愚蠢的犹太鸟”①。

银衫军的成立与发展的历程，彰显了美国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及纳粹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渗透的广度与深度。该组织完备的运作机制以及体系化、成熟化的反犹叙事，不仅深刻映射出这些极端主义理念在美国本土传播的深度渗透性，而且凸显了其社会影响范围的广泛延展性。银衫军作为融合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及纳粹主义的成功且高度组织化的反犹主义实体，其在美国的出现与壮大无疑是为极端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可以说，“成功的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在美国出现并扩展，显示了纳粹主义在美国的影响”②。

3.十字军白衫军(Crusader White Shirts)

十字军白衫军的创立者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W. Christians)来自纽约，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接受过工程师培训，同时也是美国沥青灌浆公司的所有者和一位发明家，拥有多项专利。“1929年股市崩盘导致公司的工程业务失败后他便失去了个人财富。随后便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创立十字军白衫军并任总司令。”③作为一个反金本位的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组织，十字军白衫军的反犹活动更多的是存在于经济领域。截至1934年该组织拥有10000名成员。④ “十字军穿白衬衫，前面有一个大红十字。组织者不得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该组织的职能之一是传播《锡安长老议定书》。”⑤“它威胁要与犹太人作战，因为其领导人声称犹太人反对他的经济计划。”⑥

乔治·克里斯蒂安一直在预测，他的组织“现在已经准备好行动了”，“事情随时都会爆发”，“白衫军不能再被束缚了”，并为向华盛顿进军做准备。因此在1933年底，乔治·克里斯蒂安发布了一道命令，制定了首先战胜地方政府，然后

① “Silver Shirt Weekly Hits Jews, Roosevelt Govt”, https://www.jta.org/archive/silver-shirt-weekly-hits-jews-roosevelt-gov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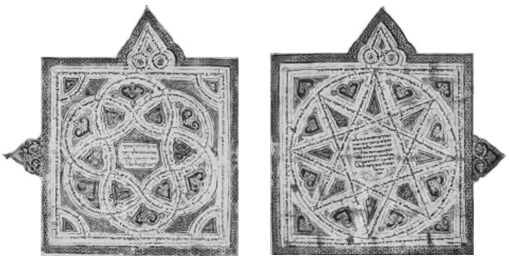
② Austin Carter Hall, *Swastikas and Sliver Shirts: The Dawn of American Nazism* (Faculty of Miami University, 2019), 3.

③ “George W. Christians,” https://fascipedia.org/index.php/George_W._Christians.

④ 参见“Crusader White Shirts,” https://fascipedia.org/Crusader_White_Shirts。

⑤ “‘Hail Christians’ Is Newest Bon Mot Offered as Coming American Salute,” https://www.jta.org/archive/hail-christians-is-newest-bon-mot-offered-as-coming-american-salute.

⑥ AJC, “The Repercussions of Hitle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8.



战胜国家政府的计划。“以军事队形前进,包围政府大楼”,准备在“那一天”到来时接管所有地方政府和首都华盛顿。[①] 该组织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相当活跃,克里斯蒂安向全国各地的副手发送捏造的报告,描述白衫军在美国偏远地区的活动。他声称自己是旧金山劳资纠纷的底层;他在全国各地分发贴纸,呼吁举行总罢工,以颁布《克里斯蒂安-麦克法登法案》(Christian-McFadden Bill HR 4747)并向华盛顿进军。

白衫军的成立与发展,深刻地揭示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组织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与发展趋势。其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领域,指责时政、叫嚣推翻政府以及对犹太人实施系统性的迫害,而且显著地扩展至经济领域,呈现出一种跨领域的极端主义倾向。具体而言,白衫军在政治层面除积极宣扬反犹主义思想,力图通过政治手段如煽动民众情绪、推动立法排犹等,以实现其排犹目标外,还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关键经济部门、剥夺犹太人经济权益的详尽经济计划,进一步加剧了犹太人在社会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此外,白衫军更进一步地开始筹划并实施武装暴力行动,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清除犹太人在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标志着该组织在行动手段上的升级与极端化,也反映出其对社会稳定与秩序的严重威胁。

(二)其他反犹团体的活动

三 K 党(Ku Klux Klan)对犹太人的固有仇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反感使其成为法西斯势力的盟友,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三 K 党已经被证明是许多独立领导法西斯和反犹运动的领袖的培训学校,因为三 K 党的名单中出现了美国各地法西斯团体的领导人。在大萧条之前,三 K 党在全国范围内被认为是一个已经消亡的反犹组织,而受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三 K 党在美国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复苏,并开始参与到反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斗争中。1932 年洛杉矶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几起反犹事件表明,三 K 党在美国西南部已经“死灰复燃”。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发生于 1932 年 11 月 16 日。在该日晚上,“一群五十多名自称是三 K 党成员的男子身着白色长袍,戴着看起来像女性的头饰在犹太裁缝戴夫·米尔德(Dave Milder)的家门前放置了一个燃烧的火十字架并闯入房屋,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开始殴打其家庭成员,重伤了其中的几个人。家中的一

① 参见“‘Hail Christians’ Is Newest Bon Mot Offered as Coming American Salute”。

名客人被发现肩膀骨折,被绑住并扔在据称属于袭击者的一辆汽车的底部"①。1933 年 9 月,三 K 党在长岛自由港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秘密会议后,在美国东部复苏。在那里,他们制订了分发宣传和最终恢复恐怖主义行动的计划。一些广泛分散的社区中发现了带有三 K 党徽章的通告,这些通告宣称:"不会容忍共产主义! 三 K 党又来了!"②

三 K 党的一个分支是工业防御协会(Industrial Defense Association),该协会于 1926 年根据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成立。"其目的是向美国人民灌输美国主义原则,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迄今为止,它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煽动国家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机关,这是一个严格的非犹太人协会。"③

基督教信仰捍卫者(Defenders of the Christian Faith)的创立者杰拉尔德·温罗德(Gerald Winrod)是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领袖,于 1900 年 3 月 7 日出生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成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极右翼活动家之一。1925 年,他创立了基督教信仰捍卫者,并在他的家乡威奇托开展活动,因此他又被称为"堪萨斯纳粹"和"松鸦鹰元首"。1933 年,温罗德将自己的神学理论与《锡安长老议定书》中的反犹太阴谋论相结合后得出结论:国际化的新政代表了政治中的"道德下滑"和外来的暴政。他将罗斯福政府视为犹太阴谋的一部分,而该阴谋"可以追溯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④ 一方面,在集会以及各种宣讲场合中,温罗德一直向他的追随者们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反犹主义小册子《锡安长老议定书》是福音真理,犹太人试图控制世界。另一方面,温罗德又积极地向人们传播反犹主义文学作品,以进一步宣传其反犹观点,包括曾经出版但现已被亨利·福特否认的《国际犹太人:世界问题》。反诽谤委员会主任古斯塔特宣称:"温罗德是美国反犹太主义的代表,他试图把犹太人钉在谎言的十字架上。"⑤温罗德在《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攻击》中宣称:"国际犹太共产主义,已经破坏了所有国家,并坚定地期望消灭所有基督徒。犹太人是所有迫害基督徒的幕后黑手。他们在全国各地游荡,到处憎恨和破坏基督教信仰。"⑥

① "Await Indictment of Sixteen Members of Ku Klux Klan for Attack on Jewish Family," https://www.jta.org/archive/await-indictment-of-sixteen-members-of-ku-klux-klan-for-attack-on-jewish-fami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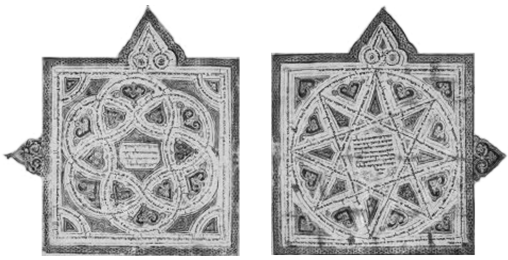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② "The Ku Klux Klan Riding Again," https://www.jta.org/archive/the-ku-klux-klan-riding-again.

③ 同上。

④ "Winrod, Gerald (1900-1957)," http://plainshumanities.unl.edu/encyclopedia/doc/egp.pd.058.

⑤ "Gutstadt Lists Race Hate Units in United States," https://www.jta.org/archive/gutstadt-lists-race-hate-units-in-united-states.

⑥ Gerald Burton Winrod, "The Jewish Assault on Christianity," http://www.balderexlibris.com/index.php? post/Winrod-Gerald-Burton-The-jewish-assault-on-christianity.



（三）国会、政府与军队中的反犹主义立场

“当政府代表多数希望维持权力和控制时，他们很容易把替罪羊手段当作政治武器。”[①]在罗斯福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国会当中同样出现了反犹主义的活动以及言论。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路易斯·麦克法登（Louis T. McFadden）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也是少数“敢于公开反对犹太人的国会议员”[②]。1933 年 5 月 29 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今天的美国，非犹太人拥有小纸条，而犹太人拥有黄金和合法金钱”的演讲，以此对美国的犹太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麦克法登在录音中还宣读了《锡安长老议定书》的摘录。当麦克法登对犹太人和“国际犹太银行家”进行尖锐的抨击时，佩利会在他的每周《解放》杂志上额外推出国会记录的这一部分。麦克法登在整个银衫军媒体中都受到赞颂。麦克法登的反犹演讲不仅通过邮件从他自己的办公室广泛传播，而且也从其他分发中心传播出去。此外，美国政府还支付演讲稿的分发费用。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认同其发表的演讲，并在背后对这一演讲内容的推送进行赞助和支持。在谈及引用议定书的内容时，麦克法登回答说：“无论议定书是真实的还是欺诈的，它们都是预言性的。政府正在落入一个诡计多端、破坏性强的犹太人组织手中。除非有什么事情影响总统回归良好的基督教经济学，否则将会出现针对犹太人控制的政府的可怕反应，也许是一场法西斯革命。”[③]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经济危机又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浪潮。因此在大萧条开始后，胡佛政府开始强制实施 LPC 条款。[④] 国务院一直受胡佛总统的白宫指示，积极拒绝任何“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人的签证申请。在 1930 年，胡佛总统又对使领馆人员下达指示，要求严格限制那些经济上困难，要靠政府接济生活的人移民美国。这无疑又加大了犹太人移民美国的难度。伴随着反犹主义和仇外心理在美国的盛行，它困扰着在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的人——负责签证审批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政府部分高层人员中同样存在反犹主义的倾向，其

① Alexander Lesser, “Anti-Semi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0 (July 1941): 545-556.

② Der Stuermer, “Jewish Influence in America Is Attacked,” https://www.jta.org/archive/jewish-influence-in-america-is-attacked-by-der-stuermer.

③ “Anti-Semitism in House of Congress,” https: www.jta.org/archive/anti-semitism-in-house-of-congress.

④ LPC 条款是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于 1930 年 9 月 9 日制定的禁止欧洲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的限制性移民条款。条款明确规定，美国驻外领事在审查移民申请时，要严格依照 1917 年文化测验法的具体要求，对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申请者展开细致甄别。一旦领事官员判定某位申请者存在这样的风险，便有权直接拒绝其签证申请。

中直接掌管难民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便是一个典型的反犹主义者。他长期持有一种观念,即犹太人是渗透进美国的"第五纵队",这一心理状态驱使他及其下属官员,对美国签证程序实施了严格的管控。

美国劳工部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对移民的处境产生同情。由于无法重写法律,帕金斯的劳工部建议设立"押记保证金",允许移民或其美国担保人向劳工部开一张支票,如果该移民需要政府援助可以兑现。基本上,这是一种有助于保护他们免受潜在公共负担的保险形式。最终,司法部部长解决了劳工部和国务院之间的争端,允许此类债券的发行。但是,当时的移民局局长丹尼尔·麦科马克(Daniel MacCormack)极力拒绝签发这些支票。[①] 在限制移民法案的实施以及保护移民政策的失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人数急剧下降。1906 年,美国犹太移民达到 153748 人次,而到了 1932 年,犹太移民仅有 2755 人次。[②] 对犹太移民的政策性限制,是反犹主义在移民方面取得的最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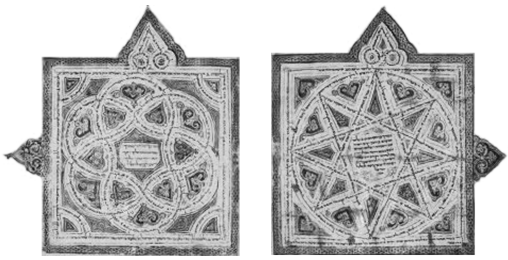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在军队当中也出现了反犹主义的趋势。1932 年 2 月 6 日,陆军和海军注册处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为什么在武装部队中没有找到更多的犹太人:"薪水很低,没有任何利润,而且他们可能会被要求为收养他们的国家而死。"[③]以此来指责犹太人不为国家效忠,且一切以贪图名誉与金钱为目的。《挑选军队人员》中有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话:"外国出生的人,尤其是犹太人,比本地出生的人更容易装病。"普拉茨堡的军官培训手册将理想的军官定义为"一个基督徒绅士"[④]。大约在同一时期,费城的报刊上刊登了广告,呼吁为国民警卫队招募"非犹太人"新兵,以此将职业军官阶层中的犹太人数量降到最低。

① 参见"Records Regarding American Anti-Semitism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s://historyhub.history.gov/b/researchers-help-blog/posts/subject-matter-expert-sme-civil-rights-blog-7-records-regarding-american-anti-semitism-in-the-national-archives。

② 参见 Jacob Reed Marcus 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 年:一部历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Jews 1585-1990],杨波 Yang Bo、宋立宏 Song Lihong、徐娅囡 Xu Yanan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238。

③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26.

④ 同上。



(四)其他群体与社会领域的反犹主义倾向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反犹主义最恶毒和最公开化的时期。”[①]除反犹组织推行的种种有组织的反犹运动以及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开发表的一系列反犹言论外,在美国社会其他不同领域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反犹运动。

教育领域也成为反犹主义的战场。某些学校和大学出现了排斥犹太学生的现象。早在 1922 年,哈佛大学时任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 Lawrence Lowell)在哈佛大学一次演讲中就提到对犹太学生的入学人数进行限制,虽然当时被董事会拒绝,但这阻挡不了反犹趋势的蔓延,1929 年 11 月,美国医学院协会的一次会议就坦率地讨论了关于犹太学生入学的数量与比例问题。《财富》杂志的调查发现:“尽管犹太人占全国医学院申请者的 50%,但只有 17%的人被录取。”[②]“实际上,美国的每所医学院都要求学生提供一份关于种族或宗教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声明,有些学校还要求学生提供照片,甚至询问学生是否曾改名。”[③]在 1914 年至 1930 年,配额制[④]在大多数东部学院和大学中已经形成。哈佛大学对持续增加的犹太学生的入学人数感到不安。

从 1926 年开始,哈佛大学向申请者寻求的信息包括“种族和肤色”“宗教偏好”“母亲的婚前姓名”“父亲的出生地”,以及对“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这一问题的回答。[⑤] 北部一些公立大学,在犹太人口众多的州找到了限制犹太人人数的方法。例如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学院(Rutgers College)在 1931 年承认,“将对犹太学生设置上限,以‘平衡’犹太人在学生群体中的比例,并防止罗格斯学院成为教派”[⑥]。它的姊妹学院新泽西女子学院(后来的道格拉斯学院)在 1930 年接受了 61%的申请者,但只有 31%的犹太人在入学时承认“他们的学术

① Richard T. Schaefer,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403.

② Beth S. Wenger, *New York Jew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

③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35.

④ 配额制(quota mechanism)指的是一种规定特定群体或个体在资源分配及机会获得方面享有固定比例或份额的制度。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曾依据学生的种族和宗教信仰,设定了严格的配额规定。特别是针对犹太裔学生,配额限制极为严格。在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犹太裔学生的数量被严格控制在不超过全校学生总数的 10%;而在禁止犹太人定居的地区,这一比例更是被严格限制在 5%以内。

⑤ 参见 Marcia Graham Synnott, “The Half-Opened Door: Discrimination and Admissions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1900-1970,” *The American Archivist* 45 (Spring 1982): 175-187。

⑥ Hasia R.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 to 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9.

地位通常比其他学生好”[①]。其中也包括许多著名院校,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辛辛那提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②]

除实施配额制度外,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部分高等院校在内部管理实践中采取了多种手段,如在宿舍分配、学习资源申请等方面对犹太学生群体设置阻碍。从1927年到1931年,“犹太人与基督徒分开安置。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一些女生宿舍隔离犹太人,而密歇根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非犹太学生则被建议不要与犹太男人来往”[③]。纽约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New York)的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申请表上有一个问题问道:“你的女儿被培养成严格遵守星期日规定吗?”[④]通过这种问题来辨别学生的宗教身份以及是否虔诚信仰基督教,以此来区别学校中存在的犹太人。

在经济危机时期所造成的广泛失业的背景下,美国本土民众认为犹太移民的持续增加挤占了本就不乐观的就业市场空间,随着就业竞争的加剧,针对犹太人的就业壁垒在成倍地增加。因此在就业领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反犹主义迹象。西弗森博士研究了芝加哥报纸上的歧视性招聘广告后发现,“从1872年到1911年的招聘专栏中没有反映出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从第二年开始,只要求基督徒或异教徒的广告的出现率为3%,1921年上升到4%,1923年上升到8.8%。1926年为13.3%;从1927年到1931年平均为11%”[⑤]。这种歧视性招聘广告的指数在大萧条时期得到了稳定的保持。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社会的反犹歧视几乎完全是社会性的,反犹主义的性质逐渐从社会性转向经济性,并且较以往更加严重。

虽然经济危机爆发几乎影响了所有社会群体,但在就业领域,犹太人受到了远比其他族裔群体更多的限制与歧视。在许多职业中,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渴望从事的职业中,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他们进入。一些医院拒绝给予犹太医生治疗病人的权利;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不会考虑聘请犹太律师;银行和许多公共事业单位也拒绝雇用犹太人,无论他们的技能如何。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美国大学担任教授职位的犹太人不超过100人。“休斯敦的亨伯尔石油公司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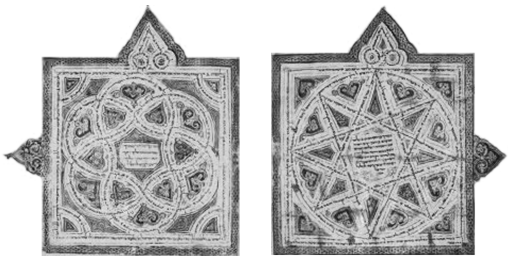
① Beryl Lieff Benderly, *Her Works Praise Her: A History of Jewish Women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282.

②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85-86。

③ Paula S. Pass, *The Damned and the Beautiful: American Youth in the 192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2.

④ L. B. Rose, “Secret Life of Sarah Lawrence,” *Commentary* 75 (May 1983): 54.

⑤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28-29.



条规定,即绝不与犹太人接触。"[①]印第安纳波利斯制药公司的伊莱·利尔在20世纪30年代雇用了近4,000名员工,其中只有两名犹太人。[②] 20世纪20年代末,犹太人占纽约市人口的26%左右,也是社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一项研究发现,"90%的白领职位都由非犹太人担任"[③]。"一位'基督徒安置专家'对27,000个案例进行的另一项检查也表明,90%的职位空缺是歧视犹太人的。"[④]"他们会给你面试机会,问你的宗教信仰,"在纽约下东区长大的简·马戈利斯(Joan Margolies)回忆说,"他们不会说他们不要你。他们会说我们会联系你。然后你出去了很多次,所以我知道他们一定是不喜欢犹太人。"[⑤]

对于犹太群体的歧视,还反映在某些社区试图破坏犹太人的社区生活,限制他们的社交活动与商业机会。20世纪20年代,许多富裕社区开始使用"限制性契约"来阻止犹太人购买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特区、洛杉矶、迈阿密、克利夫兰及其他城市郊区的一些最令人向往的房屋。20年代末,纽约市杰克逊高地的公寓业主在广告中宣传他们的建筑物受到"限制"并禁止天主教徒、犹太人和狗进入。随后发生了一场关于排除条款的法律斗争,但法院支持业主拥有选择自己的租户的权利。[⑥] 在一些波兰裔美国人社区,居民在街上喧闹抗议犹太商人的存在。他们争辩说,犹太店主剥夺了波兰商人的生计。在一些城市非裔美国人社区,可以从街角的演讲者那里听到反犹主义的言论,他们将黑人社区的毁灭性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人。[⑦]

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反犹主义呈现出一种复杂且多样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反犹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自发的、零散的偏见情绪,更在组织层面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一些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反犹主义组织在此期间活跃起来,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反犹活动大肆宣扬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歧视。与此同时,反犹主义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上至美国上层政府与官员,下至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各个阶层与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对犹

① Elaine H. Maas, *The Jews of Houst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Ph.D. Sociology Department, Rice University, 1973), 196.

② 参见 Judith E. Endelman,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Indianapolis: 1849-Pres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7-172。

③ Henry L. Feingold, *Zion in America*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74), 266.

④ Johan J. Smertenko, "Hitlerism Comes to America," *Harper's Magazine*, (November 1933), 660-670.

⑤ Interview with Joan Margolies, 27 August 1991, New Haven, Connecticut.

⑥ 参见 Susan Dworkin, *Miss America, 1945: Bess Myerson's Own Story* (New York: Newmarket Press, 1987), 12。

⑦ 参见 Hasia R.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 to 2000*, 211。

太人的歧视与偏见。

(五)犹太人自身采取的应对和保护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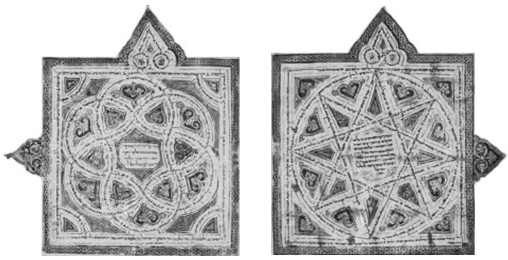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反犹主义不再局限于少数群体的偏见与歧视,而是演变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肆意蔓延。这种思潮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从文化教育到日常生活,犹太群体感受到来自社会主流的无处不在的敌意与排斥。面对主流文化中日益增长的敌意,他们不能再保持被动。沉默、爱国主义和试图以取悦外邦人的方式行事,都无法缓解其他美国人的反犹情绪。美国犹太人认识到,他们将不得不对日益增长的偏执表现予以反击,并以某种方式遏制并希望扭转这种恶性趋势。[①] 为保护犹太人免受反犹主义的伤害,并减轻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冲击,犹太群体开始积极投身于组织建设之中,成立了多个犹太组织。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是美国最著名的犹太人保护组织,成立于1906年,在1929年之前,该组织一直由路易斯·马歇尔(Louis Marshall)领导。其宗旨是促进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权。20世纪20年代,美国颁布了具有高度限制性的移民法案,其未明说的目的之一便是减少进入美国的犹太人数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强烈反对这些法案的通过,在发现反对无果后,转而努力削弱新规定对潜在犹太移民的影响。1933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发布了一本名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的手册,向美国民众呈现关于德国犹太人所遭受的压迫与暴力行为的真相,以及在当前政权统治下他们所遭受的屈辱待遇。[②] 1936年后,该委员会将其工作重点从维护犹太人权利转向打击反犹主义。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还讨论了成员如何反击人们普遍传言的犹太共产主义阴谋推翻政府论,努力强调反犹主义的非民主和非美国性质,并将对犹太人日益增长的敌意归咎于纳粹的宣传。[③] 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并未忽视其他紧迫事项。例如,它支持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ACP)通过联邦反私刑立法的努力,并为其提供了资金。事实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新兴民权运动中的积极和持续参与是其最显著的优势和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它体现了最高

①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46。

② 参见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The Factual Record of Their Persecution by the National Socialists," https://ajcarchives.org/Portal/Default/en-US/RecordView/Index/990。

③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47。



的犹太价值观——人的平等和尊严。[①]

除此之外，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同样积极投身于与反犹主义的抗争之中。该组织起源于1913年，由来自德国中西部的改革派犹太人在芝加哥创立，前身是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旨在对抗反犹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偏见和歧视，促进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其活动包括评估各国发生的仇恨犯罪和反犹主义事件，协助执法机构调查和起诉极端主义者，提供反偏见和多元化培训，以及出版反大屠杀教育课程读物。早期活动主要集中于反击舞台、电影和印刷媒体中的反犹言论和刻板印象。反诽谤联盟试图通过向学校、商会、兄弟会和慈善团体提供出版物来打击反犹主义。[②] 大萧条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导致美国出现了各种法西斯组织，包括由查尔斯·考克兰领导的基督教阵线。反诽谤联盟为此还专门开展公共教育活动，并与他人共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驳斥考克兰的反犹主张，并证明他剽窃了希特勒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演讲。[③]

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成立于1914年11月，该组织同样为争取犹太人的权益而奋斗。1914—1929年，委员会从美国犹太人那里筹集了787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以帮助海外的犹太人。[④] 在1939年的“圣路易斯号”事件中，它拯救了大部分的犹太乘客。[⑤]

20世纪30年代，反犹主义的浪潮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群体不仅依托各类犹太保护组织免受反犹主义的侵害与不公对待，同时巧妙地借助电影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介，通过制作影片来真实呈现犹太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以及揭露反犹主义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但是在最初，好莱坞犹太人并不赞同通过银幕来向公众展示反犹主义，他们认为对反犹主义保持沉默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他们担心如果通过在电影中引起人们对反犹主义的关注，反犹主义情绪可能会增加。[⑥] 而在知道种族灭绝真实发生过之后，他们意识到反犹主义似

① 参见David A. Harris,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t 100*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Springer, 2006), 6。

② 参见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457。

③ 参见Anti-Defamation Leagu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nti-Defamation-League。

④ 参见Yehuda Bauer, *American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39-1945*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 6。

⑤ 参见Patrick Henry, *Jewish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azi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4), 16。

⑥ 参见Eric A. Goldman, *The American Jewish Story through Cinem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3), 99。

乎是一个适合电影银幕的话题。[①] 1940年,查尔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制作了《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米高梅(MGM)发行了《致命风暴》(*The Mortal Storm*),试图描绘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其他电影如《空军》《紫心》《海军陆战队的骄傲》等紧随其后,展示了犹太男子为服务国家而战斗。[②] 好莱坞的犹太电影人逐步把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反犹主义现象呈现在大银幕上,这一举措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现实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时,这些影视作品也为反击反犹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工具,成为推动犹太人自我身份认同与意识觉醒的重要途径。

三、经济危机期间反犹主义激增的原因

(一)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与"替罪羊"文化

针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可将其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基于宗教层面的刻板认知,另一类则是源于经济层面的刻板观念。从宗教方面来说,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并非经济危机期间骤然爆发的社会现象,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基督教文化形成初期的宗教叙事当中。自基督教教义体系确立以来,犹太群体便被构建为具有原罪性质的"他者"——根据《新约》文本的诠释,犹太人被指控为直接导致救世主耶稣受难的元凶。这种宗教叙事给犹太人打上了集体性的罪责标签,宣称其因拒绝承认基督的弥赛亚身份而遭受上帝的永恒弃绝,注定承受世代的惩罚与诅咒。在教会权威的阐释体系中,犹太人被异化为"鬼魅般的存在"与"被诅咒的族群",其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为皈依基督教。[③] 这种宗教层面的定性为后世反犹主义提供了看似不可动摇的"神圣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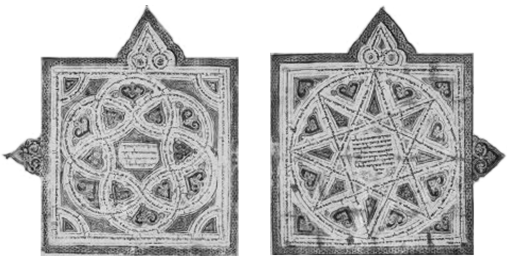
美国社会反犹现象的蔓延与基督教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密切相关。自建国初期起,新教伦理便深刻塑造着美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教会通过控制宗教话语权将反犹偏见植入主流意识形态。正如反犹主义研究专家罗伯特·迈克尔所揭示的:"反犹主义的本质是一个宗教问题。"[④]当基督教神学将犹太人定位为"永恒

① 参见Eric Goldman埃里克·高德曼,《好莱坞的犹太人》[Jews in Hollywood],王诗源 Wang Shiyuan译(北京[Beijing]:世界图书出版公司[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2014),66。

② 参见Eric A. Goldman, *The American Jewish Story through Cinema*, 51。

③ 参见Jules Isaac, *The Teaching of Contempt: Christian Roots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 109。

④ 陈恒 Chen Heng、耿相新 Geng Xiangxin,《基督教神学与纳粹屠犹》[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Nazi Genocide of Jews](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Elephant Publishing House],2007),152。



的罪人”时，这种认知自然渗透到信徒的日常生活判断中。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美国基督徒群体普遍沿用欧洲宗教传统中的刻板印象来解读犹太群体：他们被污名化为欺诈成性的商业投机者、亵渎神圣的异教徒，甚至被指控通过逃避农业劳动来规避“上帝赋予的劳作使命”。①

更具危险性的是，这些宗教偏见逐渐衍生出政治层面的指控。犹太人被莫须有地描绘成密谋颠覆美国宪政秩序的“第五纵队”，其国际主义倾向被曲解为对本土国家利益的背叛。“犹太人不时被指责拒绝拥抱耶稣，密谋破坏美国政府，更关心他们的国际兄弟，而不是他们的美国同胞。”②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指控并非单纯反映现实矛盾，而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体系持续传播着“犹太人背叛救世主”的宗教叙事，使几代信徒在潜意识中将宗教敌意转化为对现代犹太群体的本能厌恶。当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时，这些深植于宗教文化中的刻板印象便被激活，为将犹太人塑造为“社会危机制造者”提供了现成的解释依据。

从经济层面来讲，反犹主义者长期秉持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宣称犹太人群体正以隐蔽而系统的方式侵蚀国家资源与基督教社会的经济根基。犹太人被描绘成通过非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的掠夺者——他们不仅霸占继承财产，更将体力劳动者与创业者的劳动产品，以及乡村社会来之不易的果实据为己有。在反犹主义的叙事中，犹太人的财富积累被污名化为“流动的”而非“有形的”，这种财富被认为仅由贷款、股票、债券等构成，既未扎根于特定地域，也未通过世代延续的辛勤劳作获得。③

更进一步地，反犹主义者将犹太人塑造为颠覆美国传统经济秩序的力量。犹太人被指控试图瓦解以乡村社区为基础、以基督教伦理为内核的资本主义体系，其身份被刻意模糊化为“国际高利贷者”与“国内剥削商人”。“犹太人象征着金钱恶习，比任何种族群体都更突出地参与地位斗争。”④这种经济层面的指控还往往与道德批判交织：犹太人被污蔑为放浪形骸的堕落者，其生活方式被描述为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腐蚀；更极端者甚至声称其作为商业、政治乃至生物领域的“外来代理人”，正通过系统性渗透破坏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体系的纯洁性。⑤

---

① 参见 Robert J. Parker, “A Yankee in North Carolina: Observations of Thomas Oliver Larkin, 1821-1826,”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14 (October 1937): 325-342。

②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preface.

③ 参见 Jaher Frederic Cople, *A Scapegoat in the New Wilderness: The Origins and Rise of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4。

④ John Higham,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n America, 1830-1930,” 1-33.

⑤ 参见 Jaher Frederic Cople, *A Scapegoat in the New Wilderness: The Origins and Rise of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6。

这种妖魔化的刻板形象在经济危机时期获得了现实土壤。当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失业与贫困时,反犹主义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刻板印象,将社会矛盾转嫁至犹太群体:犹太人代表着控制美国的国际阴谋,也代表着各种城市罪恶——污染安息日、走私、赌博和放纵。三K党的出版物还将犹太人描述为颠覆性的激进分子、通过金钱寻求权力的夏洛克和道德败坏的"杀戮基督"怪物。[①] 原有的刻板印象在这个特殊时期得到了印证,让犹太人自然而然地成为这场大危机的"替罪羊",也使得美国民众对此深信不疑。通过将经济困境与宗教化叙事捆绑,反犹主义不仅为民众的挫败感提供了宣泄出口,更试图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巩固自身的话语霸权。

(二)经济下行导致犹太人身份地位的转变

经过数个世纪在美国社会的深耕与发展,犹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后迎来了历史性转折。凭借卓越的商业头脑与专业能力,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成功跻身美国上层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从整体社会结构来看,这一时期的犹太群体已形成多元分层,这种阶层分布使犹太社区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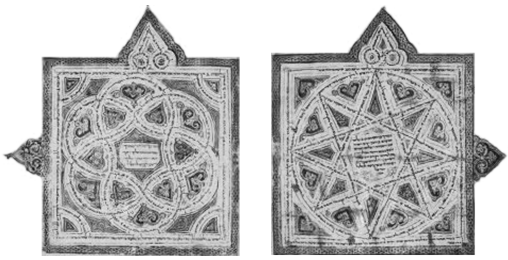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然而,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将犹太人推上了一个新的"风口浪尖",这彻底改变了犹太群体的生存境遇。"这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几年前都无法预料的。"[②]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以每年摧毁200万个就业岗位的速度蔓延,至1933年已将全国失业率推高至24.9%。当普通美国家庭平均财富缩水40%、银行储蓄化为废纸时,犹太人在商界、金融界以及其他经济领域中的显著存在,以及犹太商人相对稳健的经营状态与当时的经济大萧条相比显得格格不入,这引发了美国民众的不公正感。"因为他们在美国进步迅速,他们的社会抱负与他们的经济进步保持同步。"[③]与此同时,在19世纪末,犹太人本身又助长了公众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对其金融实力的夸大印象。犹太发言人怀着骄傲的天真,用热情洋溢的言语宣传经济上的成功。在一本流行杂志上,有人断言犹太人控制着旧金山的财政。另一个人声称,在犹太节日期间,交易所的业务几乎停止了。[④]这一刻板印象延续至20世纪仍未消散,且在经济危机这一充满敏感性的历史时

① 参见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278。

②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05.

③ John Higham,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n America, 1830-1930," 1-33.

④ 参见John Higham, "Anti-Semitism in the Gilded Age: A Reinterpretation,"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3 (March 1957): 559-578。



期,相关言论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公众对犹太人群体的忧虑与不安。因此他们往往将焦虑和挫败感转嫁到拥有相对成功的商业表现的犹太人身上,使他们成为部分人群急于寻找的替罪羊,将犹太人视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此时美国主流媒体在刺激反犹情绪的增长方面,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美国非犹太作家在报道中指出:“犹太人得益于他们的经济实力,这使他们能够免受大多数人所能感受到的经济痛苦。”[①]这种报道进一步激化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在全国各地,那些轻易接受关于犹太人具有邪恶品质的神话,并吸收了关于华尔街银行家和国际金融家恶意的民粹主义精神的人,毫不费力地相信这些经济指控。”[②]此刻更将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银行家制造的“国际金融阴谋”。

(三)经济下行引发的失业危机

经济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严峻的失业危机,直接表现为20—30年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常年的经济负增长率(见表1)。1932年,正值经济大萧条最为严峻的时期。“1931年,商业部普查显示失业人数已超1600万。至1932年,又新增400万至500万失业者。”[③]这些指数直观地反映了大萧条时期美国国内经济衰退而导致的惨淡的就业状况。在这场系统性崩溃中,就业市场的结构性扭曲成为反犹情绪滋生的温床。在这种供需失衡的极端环境下,任何群体性的职业分布特征都会被放大为竞争威胁。犹太群体因其独特的城市聚居模式与商业传统,在零售贸易、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就业集中度显著高于其他族裔。社区商业网络的密集性在经济下行期显得尤为“显眼”,这种“高存在感”,在中下阶层白人群体面临就业压力时,使得他们将面临压力的原因简单地归为“犹太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① Hasia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 to 200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10.

② Max Vorspan and Lloyd P. Gartner, *History of the Jews of Los Angeles* (Philadelphia: JPS, 1970), 206.

③ Dixon Wecter, *The Ag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4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0), 19.

表 1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①

年份	失业率	经济增长率
1929	3.2%	—
1930	8.7%	−8.5%
1931	15.9%	−6.4%
1932	23.6%	−12.9%
1933	24.9%	−1.2%

就业机会的极度缩减与犹太人对就业机会的群体性竞争对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下阶层的民众冲击尤为严重,因此这一群体的反犹情绪更为高涨(见表 2)。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沃尔德曼(Morris Waldman)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就业是反犹主义的目标,而不是原因,并补充说:“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将竞争从一种职业或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或行业,经济竞争产生的反犹主义是否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②

表 2　美国各阶层反犹分子比例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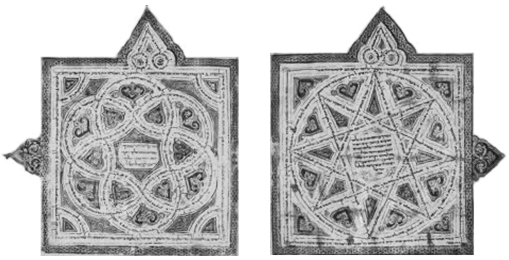
阶层	所有美国成年人	反犹分子
富人阶层	6.8%	10.4%
上层中产阶级	22.9%	26.2%
中下层中产阶级	41.7%	45.3%
穷人	20.0%	15.8%
黑人	8.6%	2.3%

在生存焦虑的驱使下,反犹主义呈现出惊人的扩大化特征: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被妖魔化为制造经济崩溃的“幕后黑手”,而布鲁克林区经营面包房的犹太夫妇则被指责“压榨本地劳工”。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许多受

① “Unemploymen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https://www.economicshelp.org/blog/162985/economics/unemployment-during-the-great-depression/.

② Morris D. Waldman, *Effects of Hitlerism in America* (Chicago: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34), 3-4.

③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03.



访者承认自己认为犹太人从基督徒遭受的苦难中获取了利益。当被进一步询问是否对犹太群体持有负面看法时,近半数的美国人明确表示了肯定态度。[①] 不管是拥有大量财富和显赫的社会地位的犹太精英,还是自食其力、兢兢业业、养家糊口的中下层犹太人,都成为唾弃与鄙视的对象,沦为众矢之的。

(四)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加剧

犹太群体作为移民者自踏上这片新大陆时就饱受敌意。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一直遭受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攻击。种族主义的影响催生出了进步时代下最著名的种族主义小册子《伟大种族的消逝》。该书作者是美国移民限制联盟和美国优生学协会的主席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经过几年的工作,格兰特总结了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WASP)对当代移民的恐惧和态度。”他在该书中说道:“即使是通过异族通婚而使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也会产生一个不符合标准的种族,但最低等级的杂种将是三个欧洲种族中的任何一个和一个犹太人的混血儿,因为这样就会得到一个犹太人。”这本充满种族主义偏见的作品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它凸显了美国白人新教徒视自己为美国“优越族群”的自豪感,以及在宗教信仰中流露出的对犹太民族强烈的厌恶与排斥情绪。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受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影响,针对犹太人的攻击行为虽时有发生,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整体经济繁荣的表象掩盖。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经济繁荣的浪潮有效缓和了此前弥漫于社会中的情绪动荡局面。这对外来者排斥心理的蔓延起到了隐性的抑制作用。[②] 然而,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开始,这两种极端主义思潮再度复苏,并在社会层面上迅速蔓延。“种族主义所催生的盲目性群体凝聚力,将社会内部积压的不满情绪转而导向对外国移民群体的排斥与影响。”[③]其中,犹太人群体尤为显著地成为种族主义攻击的焦点目标。“在种族本土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他们被刻意从其他新移民群体中区分并孤立出来——这种排外性的动荡态势将犹太人视作威胁国家的最具危险性的力量。”[④]20 世纪 20 年代见证了排外行为的增长,并在歧视性的言辞中首次出现了如此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煽动又无疑加深了歧视

① 参见 Hasia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 to 2000*, 212。

② 参见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329。

③ John Higham, “Anti-Semitism in the Gilded Age: A Reinterpretatio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3 (March 1957): 559-578.

④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278.

的程度。[①] 经济危机时期，反犹主义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土壤中吸取了养分。白人种族主义者将自身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群体的“竞争”，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排斥和迫害。排外主义者利用民众的恐惧和不满情绪，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点与排外情绪联系起来，煽动民众对外国犹太移民的仇恨。这两种极端主义思潮与反犹主义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特殊时期反犹主义的迅猛发展。

（五）希特勒推动反犹主义的宣传

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反犹主义的激增还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密切相关。战争的失败、通货膨胀的肆虐，以及经济萧条使德国民众深感沮丧。作为现代最精明的宣传家，希特勒上台之后，为德国人民描绘了新的奋斗目标，并提供了一个发泄侵略性的出口——消灭犹太人。[②] 同时，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人联系起来。希特勒认为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剥夺了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基础，它将导致人类思想中所有可以想象的秩序消失。[③] 希特勒掌权后，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大力推行并持续扩散一种将反犹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这一举措获得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支持。究其原因，当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正深陷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们深感忧虑，担心国内民众因经济困境而政治立场逐渐左倾，进而走向社会主义。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纳粹的反犹主义共同影响了美国对犹太人的态度，加上美国本土的反犹主义宣传，犹太人被塑造成了“外星人”的角色，他们是外来者，具有颠覆性的危险，应该禁止他们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取社会地位。在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的经济蛋糕不断缩水，而犹太人作为外来者分走了他们不该分的那一部分。[④] 反犹主义者攻击犹太人“在支配银行和金融，在为自己的利益操纵世界，使其他一切人陷于失败”[⑤]。大萧条的爆发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反犹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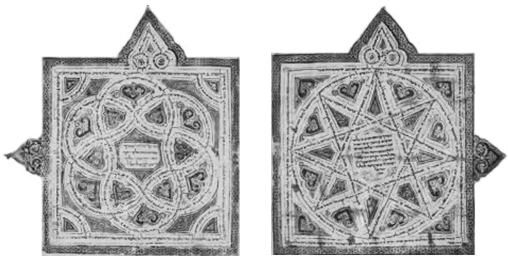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John Higham,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n America, 1830-1930,” 1-33。

② 参见 Donald S. Strong,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1940*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Introduction。

③ 参见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1925, https://greatwar.nl/books/meinkampf/meinkampf.pdf。

④ 参见 Arthur Hertzberg, *The Jews in America: Four Centuries of an Uneasy Encounter: A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251。

⑤ Gerald Krefetz 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The Jews and Money]，顾骏 Gu Jun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1991），59。



进一步发展的导火索，让本已经厌恶犹太人的美国民众在经济危机的作用下更加视犹太人为“美国的敌人”，犹太人沦为美国民众沮丧情绪的发泄对象。

美国反犹主义的历史可追溯至早期殖民时期，其复杂性与多元性植根于宗教差异、文化冲突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犹太群体在美国历史上所遭受的排斥与歧视，不仅反映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揭示了美国社会在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上的复杂性与矛盾。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反犹主义呈现出显著加剧的趋势。经济危机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紧张情绪，使得反犹主义情绪迅速扩散，另一方面为反犹主义提供了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使得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活动在更加广泛的社会土壤中迅速发展。

四、1929—1933 年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反犹主义的特点与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是反犹主义最恶毒和最公开化的时期”[①]，其恶性程度与公开程度均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经济危机为这一时期反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肆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在经济危机的催化与刺激之下，必然会呈现出较以往更为复杂且独特的特点，更在深层次上对美国社会以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与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一）1929—1933 年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反犹主义的特点

1929—1933 年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危机时期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期之一，也是反犹主义情绪显著加剧并呈现出复杂多样特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作为 20 世纪 30—40 年代美国反犹主义浪潮的开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化、扩大化、极端化、组织化以及多种极端思想相融合的特征。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这一时期反犹主义兴起的背景不再单纯基于宗教或文化排斥，而是与经济剥削、政治阴谋论等多种极端主义理论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反犹叙事体系。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社会普遍感受到了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性，这种情绪迅速转化为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敌意。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当中的少数民族”和主要的移民群体之一，成为众矢之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困境促使部分民众将犹太人视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认为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控制了经济命脉。除此之外，对美国犹太人最严重的意识形态攻击不是

①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26.

集中在宗教或种族方面,而是集中在政治颠覆上。“国际犹太人一半是银行家,一半是布尔什维克,被视为密谋夺取国家的控制权。”[①]进而将国家引向一个他们所谓的“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种将经济影响力与政治阴谋相结合的理论,虽然缺乏确凿证据支持,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在多种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反犹主义现象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且难以简单归类的局面。

扩大化与极端化也是这一时期反犹主义的显著特征。反犹主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宗教或地域偏见,而是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角落。综观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现象,其地域性特征已不再显著,而是呈现出一种全国性的蔓延趋势。仇恨犹太人的情绪在整个美国社会中弥漫。“在小城镇和大城市,在时髦的社交圈和高级会议室,甚至在国会的会场上,都充斥着对犹太人的敌意。”[②]这些现象共同揭示了反犹主义在当时美国社会中的普遍性。以往的反犹主义行为更多地局限于媒体宣传的范畴内,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操控信息传播,刻意塑造并强化针对犹太人的负面形象,从而实现对其污名化的目的。随着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其所触发的社会紧张氛围与普遍焦虑情绪持续升级,部分社会群体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通过言语对犹太人进行攻击和侮辱已经无法得到满足,更是开始企图或计划采取极端且暴力的手段以宣泄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包括暴力袭击、抢劫财物、纵火焚烧乃至蓄意谋杀等一系列的极端暴力行为。“20 世纪 30 年代,基督教阵线计划在犹太社区和企业放置炸弹,暗杀犹太国会议员,最终推翻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控制的政府,建立右翼独裁政权并消灭犹太人。”[③]“在波士顿,一群年轻的美国流氓冲过街道,高喊杀死犹太人!”[④]

在组织化方面,反犹主义团体和组织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受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功的影响,无数反犹太人团体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诞生。”[⑤]产生了诸如新德国之友、银衫军、十字军白衫军等一系列具有明确的组织结构、详尽的行动纲领、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的反犹组织,以确保其反犹主张的有效实施与持续扩张。这些组织通过系统化的宣传手段,如印刷反犹读物、集会演讲、新媒体传播等,广泛传播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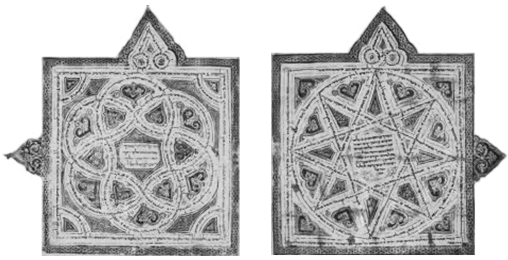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① John Higham,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n America, 1830-1930,” 1-33.

②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07.

③ Ronald H. Bayor, “Klans, Coughlinites and Aryan Nations: Patterns of American Anti-Semi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76 (December 1986): 181-196.

④ John L. Spivak, *Plotting America's Pogroms: A Documental Exposé of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Masses, 1934), 7.

⑤ 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 年:一部历史》,264。



反犹思想，将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成功地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精心策划并动员各类活动，如游行示威、暴力袭击等，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据估计，在大萧条的那 10 年里，美国可能有 1.5 万名隶属于各反犹主义组织的坚定的犹太憎恨者。”①

同时，大萧条时期的反犹主义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在德国制造的，由具有德国血统的美国纳粹分子进口的作为破坏美国对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阴谋的一部分。”②这就注定了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思潮无法以一种孤立的姿态存在，而是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等多种极端思想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复杂的意识形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反犹主义不再是单一的对犹太人的偏见与歧视，而是被多种有害思想滋养与强化，变得更为复杂多变，更具欺骗性与危害性。这些思潮在反犹主义的土壤上找到了共同的滋生地，共同推动了反犹主义情绪的升级和扩散，使得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面貌。

（二）1929—1933 年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反犹主义的影响

美国经济大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以及各种破坏性影响几乎波及了美国的各个社会群体，其中也包括犹太人。伴随而来的是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收入水平的急剧下降以及贫困率的骤然升高。“仅在 1931 年，对 30 家犹太福利机构的全国性审查显示，在一年的前 9 个月里，救济接受者增加了 42%。在巴尔的摩增长了 77%；在明尼阿波利斯增加了 100%。”③这一时期的犹太人面临着由于行业整体性萎缩而导致的收入下降以及大部分积蓄丧失的双重经济困境，这加剧了犹太各个阶层尤其是本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下层阶级人口的经济困难与困境。“从 1930 年开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犹太社会服务组织都感到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急需援助。同时，这些机构的经济来源也开始减少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性的犹太联合慈善组织都被迫缩减自己的支出，有几个犹太组织在危机的冲击下完全消失了。”④而这一时期再度抬头的反犹主义倾向也以一种更加严峻的方式放大了犹太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承受的多重压力。在反犹主义的阴影笼罩下，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重重阻碍与困扰。

在教育领域，配额制的推行深刻地映射出反犹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扩张。配额制作为一种限制性的教育政策，直接阻碍了犹太人子女获取优质教育

① 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 年：一部历史》，264。

② Max I. Dimont, *Jews, God, and History*, 372.

③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558.

④ AJC,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931-1932,” 38-44.

资源的渠道,也严重限制了他们追求更高层次学术和职业发展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配额制的存在加剧了犹太人在学术和职业发展中面临的障碍。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犹太人子女在学术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获得与同龄人同等的学术成就和职业发展机会。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损害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犹太社群的不平等与排斥。正如海伍德·布朗(Heywood Broun)所指出的:"配额制度的传播所象征的,不亚于对三K党的粗鄙行为的一种无声的文化认同,即这是一个白人的国家。"[①]配额制的实施无疑加剧了种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裂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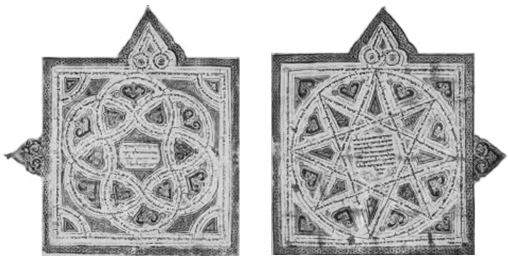
"为经济和社会弊病提供灵丹妙药的运动往往把外国人视为困难的根源和根本威胁。就劳动力需求而言,新的群体或尚未被同化的群体往往会被认为对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水平构成威胁,从而引发社会冲突,使得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受苦。"[②]因此在就业市场,犹太求职者面临着基于反犹主义偏见的求职歧视与阻碍。这不仅体现在显性的就业拒绝上,更渗透于隐性的职业晋升障碍之中。在招聘过程中,一些雇主可能会以莫须有的理由拒绝犹太求职者的申请,即使他们的资质和能力完全符合岗位要求。在大萧条期间,"仅限'基督徒'的广告定期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报纸上刊登。即使是不刊登此类广告的雇主也经常拒绝雇用犹太工人"[③]。日益高涨的就业歧视浪潮使得犹太人深感困扰,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犹太人的不安全感。面对经济萧条的压力,犹太人,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犹太人,对未来感到困扰与迷茫。他们特别担心下一代的命运。纽约犹太人眼睁睁地看着拥有高中、大学和专业学位的儿女寻找兼职工作或加入失业者的行列。年轻人的失业当然不是犹太群体独有的。但是,黯淡的就业前景、配额制度和就业歧视的结合使美国犹太人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美国反犹主义日益壮大的情况下,犹太人就业前景不断恶化,原本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犹太人在就业壁垒高筑的严峻形势下,其生活处境、经济压力无疑更加雪上加霜。

"尽管美国犹太人认识到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反犹主义,但在1933年之前,反犹主义主要是宗教、知识、语言、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但在之后,强烈的反犹主义,仇恨组织的呼吁,以及蛊惑人心的政客,加上战争的升级,特别是在东北部和中

① Carey McWilliams, *A Mask for Privilege: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39.

② Alexander Lesser, "Anti-Semi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0 (July 1941): 545-556.

③ Beth S. Wenger, *New York Jew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06.



西部的城市，超过 85％的美国犹太人居住在那里，产生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①]在反犹主义的包围之下，犹太群体普遍感受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和深切的恐惧感。“尽管 1936 年美国《财富》杂志的编辑概述了犹太人对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的恐惧，并分析了导致犹太人质疑他们在美国的安全的因素，并坚称没有理由感到焦虑。”[②]但是，《财富》杂志的有条件的保证并没有缓解大萧条时期犹太人的不确定情绪。面对如此极端不利的现实条件，犹太人迫切需要寻求有效的庇护，以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人身安全。

“鉴于基本的意识形态取向，左翼不可能是反犹主义的。”[③]左翼政党适时地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共产党人放弃了早些年反犹太教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并在犹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上直接呼吁犹太人。”[④]这一政治姿态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纷纷涌入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组织。“共产党员人数在大萧条时期达到顶峰，犹太人占纽约地区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⑤]“纽约占该党全国成员的五分之一，其中五分之一主要是犹太人。总共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吸引到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特别是各种‘反法西斯’团体。”[⑥]依托在左翼政党与组织当中的影响力，犹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左翼运动。犹太大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辩论和校园示威，犹太社区也爆发了租金罢工和生活成本抗议活动，犹太妇女也在这时联合起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至中期，激进的犹太妇女主要通过失业委员会(失业工人组织)和工人阶级妇女联合委员会参与社区活动。”[⑦]

同时，部分犹太人开始领导社会主义组织。“共产主义组织者本·戈尔德(Ben Gold)领导了一个复兴的毛皮商工会，长期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和大卫·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领导了联合服装工人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工业组织大会。”[⑧]在反犹主义的持续压迫下，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捍卫自身利益，犹太人开始团结并

①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126.

② Russell, “Jews in America,” *Fortune* 13 (February 1936): 141.

③ Walter Laqueur, *The Changing Face of Anti-Semitis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54.

④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563.

⑤ Beth S. Wenger, *New York Jew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06.

⑥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564.

⑦ “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communism-in-united-states.

⑧ Beth S. Wenger, *New York Jew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04.

联合起来,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左翼运动,极大地增强了犹太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犹太社群在逆境中坚守阵地、争取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1933 年美国经济危机时期的反犹主义以其扩大化、极端化、高度组织化等特点在美国反犹主义发展史、美国犹太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作为 20 世纪 30—40 年代美国反犹主义扩大化的开端,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街头巷尾的窃窃私语,到报纸杂志的公开诋毁,再到政治舞台上的恶意攻击,犹太群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排斥与迫害。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不仅是对犹太民族身份的一种极端负面表达,更是对当时美国社会复杂性与多元矛盾的一次深刻揭示。它如同一面透镜,折射出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社会的众生百态,包括经济的动荡不安、民众情绪的普遍焦虑以及对“替罪羊”心理需求的加剧。重新审视美国反犹主义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在大萧条之前,反犹主义的发展轨迹虽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但各阶段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且缺乏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作为明确划分依据。因缺乏统一的线索或明确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历程显得相对模糊。然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如同一场历史性的“重置”,“重塑”了反犹主义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使其“清晰度”得以显著提升。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经济危机期间的反犹主义表现,更为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反犹主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无论反犹主义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都或多或少地残留有这一阶段反犹主义的影子,成为美国犹太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痕迹。